

后现代主义视角下中国的媒介变革

赵云泽 赵国宁

〔摘要〕 当下中国的媒介文化表现出浓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气息，即对现代性的三大基石“理性”“主体性”和“真理（知识）”的质疑和否定，突出表现为：摆脱“理性”的“媒介交往”，媒介中主体性的“矮化”和“消解”，解构“深度”“宏大”的叙事风格，媒介革命背景下“国家—个人”对立关系的“消解”等。后现代主义从现代性的内部吸收养料和创造力量，以达到超越现代性和重建人类文化的目的。对当下中国的语境而言，后现代性的张扬，一方面是在探寻高于“现代性”的未来图景，另一方面也是在逆向要求“现代性”基础的夯实。后现代主义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社会的视角，也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展现了另一种视野。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媒介；主体性；媒介变革

〔作者简介〕 赵云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国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后现代主义是 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开始出现的对现代主义进行反思的社会文化思潮，对现代性的种种弊病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虽然致力于彻底否定现代性，但现代性却是后现代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后现代主义一方面与现代性对立，另一方面又渗透到现代性的内部去解构、消耗和吞噬它，从它那里吸收养料和创造力量，以达到超越现代性和重建人类文化的目的。”^①

西方继 20 世纪 60 年代有关后现代的讨论之后，70、80 年代再次掀起对后现代的讨论高潮，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国著名思想家让-弗·利奥塔与哈贝马斯展开了一场关于‘现代性是否终结’的学术讨论”^②；二是“后现代话语在各个领域迅速扩张，种种‘后学’诞生，如后工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③，等等。中国自改革开放后，逐步与世界沟通和接轨，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代”思想全球浪潮的影响。并且，由于中国当下既具有跟进的现代化建设，又出现了与西方同周期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现象，二者的张力和冲突尤为明显。传媒业作为对于文化思潮最为敏感、通常集中于发达地区的行业，在近年来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更加突出。

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三点，即凸显个人的主体性，坚持理性至上主义以及对知识和科学的崇尚。^④它终结了中世纪以来教会及其神权统治带给人的束缚和控制，追求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治与技术双重动因下的中国网络媒介形态演变机制研究”（15BXW072）

① 高宣扬：《后现代论》，11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②③ 张从良主编：《从解构到建构：后现代思想和理论的系谱研究》，2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④ 张世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的解放。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性走向了它的反面,主体性的扩大和膨胀带来人与自然的对立和脱离,对理性的极端强调剔除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和情感,对知识、科学的崇尚使人们被规则所束缚,同时成为权力的规训对象。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宗教经历了从“囊括一切、波及一切”^①到“上帝退隐避居,把整个世界都交还给了人”^②,“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只是削弱了传统宗教的力量,但同时创造了一种将个人神化的新宗教。”^③后现代主义由此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当下中国的传媒实践中表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与上述后现代主义否定现代主义的三个关键点尤为贴近,体现为媒介交往对“理性”的摆脱,媒介中主体性的“矮化”甚至“消失”,叙事上对“深度”“宏大”和“真理(知识)”的解构,以及社交媒体场域中“国家一个人”对立关系“消解”的可能性,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社会的视角,也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展现了另一种视野。需要指出,上述三者的关系绝非互相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并延展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重新审视当下中国所发生的媒介变革。

一、摆脱“理性”的“媒介交往”

西方世界的“理性”观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朱光潜指出:“依他(柏拉图——引者注)看我们所理解的客观现实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有理式(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客观现实世界只是理式世界的摹本”^④。在此,人们追求永恒不变的虚无的“超验世界”,对现实感知却置之不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文化和西方理性文化都来自柏拉图上述的“理念论”。^⑤“理性”与“上帝”一样“永远正确”,当现实与理性或上帝发生冲突时,要做出让步的是人们的现实体验。所不同的是,相较而言,基督教的“神权体系”更加简单、模糊,而“理性主义”则更为复杂、隐蔽和精确,理性与权力、知识结合,建构起以逻辑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理论体系。

尼采则对否定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复杂多变的“理性”给予了批判,他认为逻辑是一种“因果化、抽象化、一元化和系统化的”^⑥对世界进行把握的方式,而之所以“世界表现出了逻辑性,因为我们事前使世界逻辑化了”^⑦,使得“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的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出他们的手掌”^⑧。尼采认为,“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有充足理由”^⑨,因此,在艺术的追求上,他批判追求理性的日神——阿波罗精神,赞颂狂热、放纵、癫狂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

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说:“人们一直认为中心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它是矛盾的,它既在结构之中,又逸出结构之外”^⑩,即中心并非固定存在,而是在不同范围内不断置换。^⑪由此他解构了现代性的一元理性,追求差异、多元与变化。利奥塔也对启蒙运动以来对“普遍化”和“理想化”的追求进行了否定,一方面,他批判现代性形而上学通过逻辑对人的抽象化、简单化和理想化;另一

①②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95、1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③ 高宣扬:《后现代论》,1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④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⑤ 贾鲁华:《从虚无主义到新价值观念的确立——尼采的建构性思想探析》,载《文艺评论》,2014(3)。

⑥ 马丁·海德格尔:《尼采十讲》,92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

⑦ 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2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⑧ 尼采:《偶像的黄昏》,20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⑨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Berlin: De Gruyter, 1872, p. 24.

⑩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Classics, 2001, p. 352.

⑪ 唐冬冬、李明:《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转型期政治改革的启示》,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方面，他延续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理论，强调生活的不确定性，反对一成不变的僵化。

后现代主义对逻辑、统一、确定、“理性”的否定对于新闻媒介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现代大众传媒强调客观、中立和“理性”，这既是其工作基本原则，也是大众传媒存在合法性、权威性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理性的框架之内，在遵循原则与一元思维的基础之上，其生产出来的新闻产品才能够得到一般意义上的认可，才会被其传播对象认定为真实，进而实现附加在其上的劝服功能。脱离了理性框架，媒介也就不再能够保持其中心性，专业化新闻信息产品，无论其产制多么成熟，在理性框架内看起来逻辑多么严密、合理，在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时代”的大众看来，不过是众多对问题审视的一种方式，是多元、差异化声音当中的一种观点。从具体微观层面来看，从事新闻生产的新闻从业人员本身即带有深刻的文化烙印，有各自意识形态立场，不可能达到绝对理性和客观公正，所谓的客观中立也不过是尽量保证生产出来的新闻信息做到“形式客观”而已，观点和立场都隐含在对事实的选取和安排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新闻信息生产不能脱离人而存在，因此媒介呈现的永远都是现实世界的一个面向，展现一种立场。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全面呈现不能单单依靠简单逻辑化的新闻媒介，还需要更加多元的补充，尤其是脱离出“理性”框架束缚的群体对世界认知新鲜视角的补充。当然，这对于将“理性”内化于自身而作为唯一生存法则的传统媒体而言是不可理喻的，在传统媒体的视野中，社交媒体的言论是不可理喻的，讨论缺乏“理性”，往往“听风就是雨”，表现出无限情绪，盲目扩大，任意的嘲讽和戏谑。殊不知这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充满复杂的观点和情感的交织，而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世界无疑是被简化、规制了的。

此外，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理性”对人的情感的压抑、对真实世界枯燥的简化在当下媒介中也有生动的体现，如兴起于21世纪初的“真人秀”类节目。这类节目展示了人们日常生活丰富、多元的体验，做到了无论是对普通人还是对名人的立体化呈现，不再是枯燥的单维度塑造；在情感方面，既有节目内嘉宾的情感互动，也有节目外观众对节目内容的情感共鸣。此类节目不同于经过编排、按照逻辑主线反映人类宏大主题的影视剧，也不同于追求条理的新闻、谈话类节目，其所反映的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平淡、甚至混杂，显示出被理性框制下的人们对丰富、多元情感的呼唤。这种温和的反制形式以渗透的方式在现代理性框架内取得了合法地位，并且以超高收视率压倒其他类节目，实现了对“理性”媒介内容的柔性反抗，它使得“理性”内容达不到受众一端，进而使“理性”在传播过程中消解、失效。又如席卷全球的“后真相”现象，更深刻地诠释了当下社会中人们的后现代主义的倾向和思潮。在现代主义的刻板印象当中，“真相”是最为重要的，被视为新闻业的生命。而“后真相”现象极具嘲讽地否定了这一命题。它表现出人们对机械理性的否定，情感的作用时常超越了“理性”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而且表现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合理性。

二、媒介中主体性的“矮化”和“消解”

“主体性”也是启蒙运动的一大成果，它打破了中世纪以来以“神”为主体、为中心的宗教统治，与“禁欲”主义相对，强调对“人”自我的回归，达成了对人性的解放。黑格尔说：“只有通过我的自由思索，才能在我心中证实，才能向我证实……凡是应当在世界上起作用的、得到确认的东西，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思想去洞察。”^①有学者分析道：“主体理性的无限夸大带来的恶果是人类不能承受之重，为了克服主体膨胀，主体就不能被看作是脱离了普遍法则和绝对精神的独立存在。”^②“主体性”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概念，它既强调人的自由主体权力，同时也强调对责任的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② 杨乔乔、张连良：《“主体性”的三次转向——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载《求是学刊》，2018（6）。

承担。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无限的扩张性,“主体性”概念开始异化,具体表现为单方面对权力、自由、自我的追求,而忽略对社会义务、责任的承担。主体性由此走向了极端,开始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并将其作为人类主体性的表征。

于是,后现代主义开始了对“主体性”的解构,它否定了自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元论。在后现代主义框架里,不再有凌驾于外物之上的主体性,不再有所谓绝对“客观”的标准。^①后现代主义认为“人和他人、和自然相比,并没有更为特殊的地方,人没有理由获得对他人、对自然的统治权和占有权,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②。由此,他们提出了“关系中的自我”,将人置于与他人、自然等的关系当中。而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重建之时,哈贝马斯提出了“主体间性”,强调“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③的重要性。

在工业革命以后所建立的现代体制下,大众传媒(当下语境中的“传统媒体”)在传授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受众只不过是受摆布和接受影响的“原子”。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中国的传统媒体在传授关系中这种“主导地位”体现尤为明显,在大众传播的关系中,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媒体展开的,传播的内容和效果基本上是由传统媒体所决定的,“宣传”模式是媒介主体性的典型体现。在民间话语的体系中,“上了新闻(报纸、电视)”一度也成为某个人或某个单位特别具有“政治仪式感”的事情。

传统媒体对主导地位、垄断地位的追求,实际上是人的极端主体性的体现,即社会精英阶层单方面对权力、利益的追求,而逐渐忽视公共性和社会责任,并认为在“规则”内的媒体对舆论的作用是无所不能的,媒体成为“建制化”的传声筒。社会中的大人物,政治、商界、学界领袖,成为传统媒介的宠儿,“人”似乎是自然界和“人”自身世界的绝对主宰。然而伴随着互联网媒介的发展,媒介中的主体性一直被“矮化”,直至被“消解”。从网页新闻,人们在评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戏谑、反讽,媒介中的主体性开始逐步“矮化”;到博客和微博、微信兴起之后,“媒介”的高大身份首先被“消解”,人们只会说“某某人”说了什么,而不会表达为“新浪微博”或“腾讯微博”上说了什么。“微信”“微博”实质上只是人们发布信息的技术平台,媒介的话语垄断地位和权威性已在“发言者身份”的确认中悄然消解了。甚至“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媒介”也成为模糊不清、无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了。这也是对“权威”规则的进一步解构。

媒介中主体性的“矮化”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传统媒体、门户网站体现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如进入博客阶段,仍然是“大人物”的主体话语,而微博、微信的流行,使得话语主体的迁移深入最基层的“小人物”,形成一种离散性的主体,而在公共事件的讨论中,甚至是“消失的主体”,人人都是旁观者,人人又都是参与者。如曾经在中国异常活跃的BBS,由于“群主”的权力太大,主体性体现太过明显,其走向衰落似乎是必然的。相对而言,微信“群主”除了能“拉人”和“踢人”以外,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在微信群当中体现的是“多主体”之间的互动沟通,乱而有序,实现了消除绝对主客体基础上的“交往互动”关系主体的再建构。

媒介“主体性”的丧失曾一度使“精英”阶层异常恐慌。先是对“网络匿名性”的担忧,这种担忧甚至延续到立法的层面,而这种传统思维模式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症结。无数的网民仍然在各种意见流之间穿梭,碰发、演变出各种观点和情绪,甚至是“不负责任”的,然而其“主体”确是缺席的。人人都是主体,人人又都不是主体,在“围观”和“质疑”之中产生了强大的颠覆效果。后现代主义主张差异和多元,反对话语霸权,从而颠覆中心性主体。但后现代思潮并不是要真正否定人和

① 张从良主编:《从解构到建构:后现代思想和理论的系谱研究》,21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② 许晓平:《后现代视野中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与重建》,载《北方论丛》,2005(3)。

③ 徐健、徐瑞:《后现代主义解读:主体性的消亡与重建——兼论主体间性与认知》,载《社会科学家》,2009(9)。

人的主体性，而是要否定那种体现支配关系的占有主体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横性主体。

在社交媒体网状的传播关系中，话题的内容不在乎是“谁”说的，也不在乎被谁“听”到。在关系网的语境下，通过“互文”体现内容的价值和诉求。所有的文本都具有多种含义，而不是只有一种含义，这些含义也并不是固定地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通过“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体现出来。^①这种“互文”除了在认知方法论上存在以外，在当下中国的社交媒体场域中，文本意义的解读也是如此。在社交媒体中，表达者之间的“关系”是构成群落最重要的因素。“关系”以外意味着不具有共同语境而会被排斥，他们互相之间交流的“语言”对“关系”以外的人而言也是难以理解的。因此，不断更新的“网络语言”是在通过排斥“关系”以外的他人而彰显群内个体的独特性、自我存在感，更是消除“中心主义”、抵抗“一致化”的“传统媒介主体性”的一种反叛。

三、解构“深度”“宏大”“真理（知识）”叙事的传媒变革

现代社会依据理性中心主义原则建构和发展，其中“真理（知识）”又是其建构理性体系的核心手段，因此解构现代性必然要指向对“真理（知识）”的解构。后现代主义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一方面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同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紧密关系，另一面也看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现代性的解构提供了条件”^②。科学知识既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时又与权力结合，成为统治阶层规训的手段。对此，福柯就意识到，“知识问题不只是属于人的纯粹认识活动，也不仅仅为了达到认识客观对象的真理而已，而是为各个历史时代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所控制，并为统治者服务”^③。“真理（知识）”首先服务于其所处的社会运行系统，真理问题的争论不仅是科学观念的争论，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歧；其次，知识塑造一系列标准与规则，符合即正确，否则就被排斥，为统治者追求同一、统一打下良好基础，方便其对社会成员的管理和规训；另外，“真理（知识）”的生产、确立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型构与阶层确立过程，通过对“真理（知识）”的定义，社会区分出了知识生产者与知识接受者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为统治者的权力垄断提供了必要便利条件。^④这就形成了贝尔所讲的现代性社会特有的“科技专制”。

由此，在叙事层面，后现代主义者首先表现出对装点“真理（知识）”的“深度”和“宏大”概念的解构。福柯强调：“所谓深刻意义、内在本质、终极解释云云都是历史的虚构，人们对于事物的探索不能离开其表面，表层比所谓的深层更有价值，一切深奥的东西都在表层。”^⑤这里的表层是指客观现实，客观现实的背后不存在更加深奥的规律和意涵，对“现实”深度提炼的过程，实质上是知识阶层附加权力的过程，脱离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此外，作为后现代主义学者的利奥塔“怀疑宏大叙事”^⑥，原因在于“宏大叙事之所以‘宏大’或说‘超元’，乃是因为它设定游戏规则，它说了算，因而它是排他的、单一的、极权的”^⑦。宏大叙事总是试图勾勒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并论证其合理性，如此一来排斥了边缘意见，因此，后现代主义提倡“微观叙述”，反对代表中心化的“宏大”叙事。

在传媒实践当中，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两大事件直接冲击了媒体人以往对于“真理”的认知，让其陷入“后真相”的恐慌。“后真相”一词在2016年一跃成为各大媒体最流行词汇^⑧，其使用频度较以往增长了2000%。虽然这对于一向倡导以“真实”为生命的新闻媒介是无法

① 刘永涛：《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一个基本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7）。

②③④ 高宣扬：《后现代论》，144、289、289-29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⑤ 张从良主编：《从解构到建构：后现代思想和理论的系谱研究》，1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⑥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Minncapolis UP, 1984, pp. xxiv.

⑦ Simon Malpas. *The Postmoder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24.

⑧ 蓝江：《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载《探索与争鸣》，2017（4）。

接受的。然而,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当下正在经历这样的变革。人们认为媒体信息与权力、资本结合,丧失了原有的公信力,因而转向诉诸自我感受。

甚至传统媒体曾一度引以为荣的“深度报道”也在互联网的语境中被消解。“深度报道”几乎是许多老牌媒体人仅剩的优越感,然而这种荣誉也正在被解构。从2015年开始,很多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部门也开始纷纷撤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传播模式的变革。首先,传播的生态从“独家的深度”走向了“众说的深度”。开放式的社交媒体吸引了大量的用户参与事件的讨论,对于社会事件的认识往往可以在讨论中达到更深入的水平。尽管最初的消息不一定全面或客观,甚至存在偏差,但是开放平台上的信息多向流动使其有着强大的指向真相的功能,有利于真实图景的迅速拼接。“众说”的过程以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事实和观点掩盖了传统媒体的“独家深度”。其次,从“居高临下的说教”走向了“平等参与的讨论”。^①大众传播自兴起之初就天然地带有精英主义色彩,传统媒体在深度报道中往往不自觉地扮演着说服者的角色。然而在社交媒体上,受众同时也是信息的发布者,所有人可以平等参与讨论。地位上的对等,使“说服者”的角色正在被解构。事实上,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主要体现在“把关人”对于新闻事件的解读,更多展现了媒体的态度和价值观,是一种“他把关”的阅读,读者处于被“喂养”的阅读状态,而后现代主义背景下,读者正在从这种状态下逃逸。

在叙事层面,社交媒体的“微观叙事”方式则在摧枯拉朽地颠覆着传统媒体的“宏大叙事”。“政治正确”的宏大叙事正在被碎片化的信息、生活化的叙事所瓦解,从传统意义的“理性”“革命”“斗争”视角都很难解释。这种叙事革命从网络媒介的内容变革开始蔓延,直至几近摧毁整个传统媒体行业。人们对传统媒体宏大叙事是冷漠的、甚至是反讽的、抵抗的,这种冷漠甚至不关乎政治观点,也不关乎媒体是否专业。而社交媒体的碎片化信息、生活化叙事却渐渐成为媒介话语的主流。

以上的叙述方式充斥在社交媒体中,这样的叙述方式有其消极的一面,尤其对于中国这样还没有彻底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而言,旧的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增加新的矛盾。所以,当下中国面临较为复杂的治理逻辑,当下中国不论从人们的思想、素质,以及社会发展程度,都是发达和不发达的交织在一起、“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织在一起。而社会进化的逻辑是,激进的总会覆盖保守的。“后现代性”是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发展。在媒体的叙事风格上,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当民族存亡的压迫尚未解除之时,强调“集体”“团结”“一致”等话语是媒介话语的主流。各国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政党报刊的时期。即使现代政治制度确立,当一国出现集体性的安全威胁时,往往宏大叙事的需求也会立即凸显。然而,当现代性发展成熟之时,个人对于生活状态便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即开始从“集体”的解放开始转移到更加在乎“个体”“自我”的解放,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四、媒介革命背景下“国家一个人”对立关系的“消解”

德里达认为,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主体二元对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国家、社会当中在政治上的根本矛盾。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的整个西方学术史都把对立的二元设想为一种以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对于德里达而言,这样的一种结构是带有从属性的、暴力性的。^②而且也正如利奥塔所评价的,这种结构体系本身带有着“社会整体化的危险”^③。由此,后

① 赵云泽、黄圣淳:《当下已被解放的“深度”》,载《青年记者》,2015(6)。

②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

③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58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现代主义针对主客二元对立的矛盾，提出应追求二者关系的平等、多元与交往。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向往的未来辐射出了明显的东方维度。罗蒂的后现代文化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人文观念就极为相似，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哲学、史学和文学处于一种纵横交错的融合状态，诸科学领域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学科分界、不存在等级差异，各学科之间可以相互启迪、相互作用，处于一种和谐状态。^① 还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推崇古代中国老子和庄子的生活哲学”^②，对内自我反思，对外灵活应对复杂的生活变换。从本质上来讲，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对现代性极端强调主体、理性、科学造成的对人的压抑的一种反抗，“过犹不及”的现实转而让其寻找一种适度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等等。这对于具有“和”文化的中国来讲，提供了一个解决“后现代”解构一切问题的视角和思路。

针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媒介领域的亢奋表现，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也并非无路可寻，关键是认识到“国家一个人”对立关系走向消解、话语权走向平等的历史趋势。从纸质版《人民日报》到网络媒介“人民网”“人民日报微博”，再到“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主流价值观的内容越来越受欢迎，而且有效覆盖面越来越大，可谓是在全球传统传媒业衰落的背景下一个成功的探索。《人民日报》纸质版发行量历史上最高的时候不到600万份，而“人民日报微博”平台粉丝总数达9200万，“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累计下载量超过1.7亿，“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粉丝超过1000万。而且这种新媒体粉丝量的增长完全是一种自愿的订阅。以往对纸版内容的戏谑、反讽和冷漠也在“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不见踪迹。而“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也不乏“正能量”的内容，类似《这位巡警的“累瘫照”走红，微信好友潮水般走来》^③这样的文章，并没有遭遇反讽和解构，而是以一种“要给他介绍女朋友”的诙谐方式表达认可。“好人好事”回归到了社会原本的意义之上。相较于传统媒体“说什么都不对”“怎么说都不对”的尴尬，人民日报社交媒体版成功地实现了转型。从纸质版的《人民日报》到社交媒体的“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手机新闻客户端，体现出后现代语境下媒介的两个转变：首先是叙事风格的转变，从宏大的叙事转变到生活化的叙事；其次是话语权的转场，从高高在上的机关报姿态，回到“人民”之中，完成了“平民化转变”。这就使得以往凸显“国家一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改善，所谓“两个舆论场”的尴尬也在消解。媒介在对关系的调整、权力的调节，强调以平等姿态的交流，追求媒介与用户之间的和谐关系方面取得了成功。

积极的后现代主义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国家的结构”可以转向为一种更为稳定的结构，消弭“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对立关系，由国家对个人的治理范式，转向“个人”同“个人”的治理范式。至少在媒介话语权上，消除了先天性的“背景特权”。当然这一切又建立在现代性的“法治”“平等”观念之上。每个个体发言者在保证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回归对人的最终解放的探索。因此，对当下中国的语境而言，后现代性的张扬，一方面是在探寻高于“现代性”的未来图景，另一方面也是在逆向要求“现代性”基础的夯实。

五、结 语

后现代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在哲学范畴内开始兴起，引发了西方世界的广泛讨论，到80年

① 张从良主编：《从解构到建构：后现代思想和理论的系谱研究》，21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② 高宣扬：《后现代论》，8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③ https://mp.weixin.qq.com/s/vNB7xdWow_uhOkRnsLbZug, 2017-04-21.

代已经开始辐射向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等。如今“后现代”已经融入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体系,成为我们对当下进行反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后现代主义虽然表现出了种种对现代性颠覆性的否定和打击,但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它是对现代性社会发展中浮现出来的种种弊端、矛盾与危机的一次诊治。虽然后现代主义最初表现得过于激烈,以毁灭性的攻势企图击垮整个现代社会体系,但随着其内部的调整,后现代主义在指出当下问题的同时也呈现出建设性的向度,时下所广泛传播的正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对“理性”“主体性”和“真理(知识)”的反对也是基于这些理念极端化发展带给人的束缚与压制。因此,诸多后现代主义流派指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追求平等对话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从而不断实现社会的自我超越,建设出更加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文化氛围。

从传媒业来讲,当下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变革是双面性的,媒介技术更加发达,可运用的手段更加多样化,传播所受到的时空限制越来越少;然而,就在处于繁荣信息场域与技术环境中的传媒人想以“自我本位”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发挥现代社会赋予其的各种功能之时,却猛然发现其传播的信息已经无效。媒介在现代社会的熏染之下,信息不再单纯,它们与权力、资本结合,成为对民众施加隐形影响的工具。因此,当下与其说是媒体权力的下放和地位的下移,不如说是对其信息渠道属性的一种回归。中国传媒行业也只有建立在平等、重新调整与用户关系(包括主体间关系和权力关系等)的基础之上,才能再次适应当下传播环境变革,实现各主体对于传媒正当功能的期待。

Media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sm

ZHAO Yunze, ZHAO Guon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ese media culture shows a strong post-modernist cultural atmosphere, that is the three cornerstones of modernity, the questioning and negating the corner stones of modernity “rationality”, “subjectivity” and “truth (knowledge)”. In the media field which is sensitive to the social culture changes and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changes, it is highlighted as: getting rid of the “rational” media communication, subjective “dwarf” and “dispelling” in the media, deconstructing the “deep” and “great” narrative style in the media revolution and eliminating the “State-Personal” opposi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media revolution. Postmodernism absorbs nourishment and creative power from within the modern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ranscending modernity and rebuilding human culture.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China, on the one hand, the publicity of post-modernity means exploring the future picture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modern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required to enhance the basis of “modernity” in reverse direction. Postmodernism not only provides us with a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society, but also shows us another view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media; subjectivity; media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 林 间)